

博雅
教育

全国英语专业博雅系列教材

总主编 丁建新

文化研究

丁建新 谭 晖 等著

LIBERAL EDUCATION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英语专业博雅系列教材/总主编 丁建新

文化研究

丁建新 谭 晖 易莲媛 王 晶 著
林 燕 沈文静 刘向东 朱海玉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研究/丁建新, 谭晖等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8
(全国英语专业博雅系列教材/总主编 丁建新)
ISBN 978 - 7 - 306 - 05801 - 0

I. ①文… II. ①丁… ②谭… III. ①文化研究—英语—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0 -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5863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熊锡源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刘学谦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10 印张 1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全国英语专业博雅系列教材编委会

总主编 丁建新 (中山大学)

编 委 会

李洪儒 (黑龙江大学)
司显柱 (北京交通大学)
赵彦春 (天津外国语大学)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夏慧言 (天津科技大学)
李会民 (河南科技学院)
刘承宇 (西南大学)
施 旭 (浙江大学)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
杨信彰 (厦门大学)
徐畅贤 (湖南城市学院)
李玉英 (江西师范大学)
李发根 (江西师范大学)
肖坤学 (广州大学)
官 齐 (暨南大学)
张广奎 (广东财经大学)
温宾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杜金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阮 炜 (深圳大学)
张晓红 (深圳大学)

博雅之辩（代序）

大学精神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人在寻找出路。

我们的坚持是，提倡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因为大凡提倡什么，关键在于审视问题的症结何在，对症下药。而当下之困局，根源在于功利，在于忘掉了教育之根本。

博雅教育之理念，可以追溯至古罗马人提倡的“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其目的在于培养人格完美的自由思考者。在中国教育史上，博雅的思想，古已有之。中国儒家教育的传统，强调以培养学生人格为核心。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体现的正是我们所讲的博雅理念。“学识广博，生活高雅”，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并无二致。

在古罗马，博雅教育在于培育自由的人格与社会精英。在启蒙时代，博雅教育意指解放思想，破除成见。“什么都知道一点，有些事情知道得多一点”，这是19世纪英国的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博雅的诠释。同一时期，另外一位思想家，曾任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理念》一书中，也曾这样表述博雅的培养目标：“如果必须给大学课程一个实际目标，那么，我说它就是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它的艺术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是对世界的适应……大学训练旨在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一个民族的趣味”。

博雅教育包括科学与人文，目标在于培养人的自由和理性的精

2 文化研究

神，而不是迎合市场与风俗。教育的目标在于让学生学会尊重人类生活固有的内在价值：生命的价值、尊严的价值、求知的价值、爱的价值、相互尊重的价值、自我超越的价值、创新的价值。提倡博雅教育，就是要担当这些价值守护者的角色。博雅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素质教育、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关心人类的终极目标，不是以“有用”为标准。它不是“万金油”，也无关乎“风花雪月”。

在美国，专注于博雅教育的大学称为“文理学院”，拒绝职业性的教育。在中国香港，以博雅教育为宗旨的就有岭南大学，提倡“全人教育”；在台湾大学，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涉及文学与艺术、历史思维、世界文明、道德与哲学、公民意识与社会分析、量化分析与数学素养、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八大领域。在欧洲，博雅教育历史中的七大范畴被分为“三道”（初级）与“四道”（高级）。前者包括语法、修辞与辩证法，后者包括算术、几何、天文与音乐。在中国大陆的中山大学，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倡博雅之理念，让最好的教授开设通识课程，涉及现代学科之环境、生物、地理等各门。同时设立“博雅学院”，学拉丁，读古典，开风气之先。

外语作为一门人文性很强的学科，尤其有必要落实博雅之理念。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应用型”教育在于博雅。早在 20 世纪 20 ~ 40 年代，在水木清华的外文系，吴宓先生提倡“语”“文”并重，“中”“西”兼修，教学上提倡自主学习与互动研究。在《西洋文学系学程总则》中，吴宓明确了“博雅之士”的培养目标：

本系课程编写的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方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

博雅之于我们，不仅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课程体系，是教材，是教法，是实践，是反应试教育，是将通识与专业熔于一炉。基于这

样的理念，我们编写了这套丛书。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人之为人是有他内在的生活意义，告诉我们的学生去求知，去阅读，去思考，去创造，去理解世界，去适应社会，去爱，去相互尊重，去审美，去找回精神的家园。

无需辩驳，也不怕非议。这是我们的坚守。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 所长

丁建新

2013 年春天

前 言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
的词汇》中认为“文化”是英语中最复杂的词语之一。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他的经典著作《作为实践的文化》中也强调文化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人所共知的根深蒂固的模糊性。他将文化分为作为概念的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三个维度。作为分立的文化话语语境,这三者的区分提供了不同的文化话语语境,也决定了文化话语必然包含的矛盾性。而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将文化的含义从“耕耘”“农作”之外,拓展到精神心理、社会日常行为、装饰性活动等三个层面。这与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言文化是包括了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一样,指出了文化作为人的价值、行为和结构自主领域其内涵的丰富性,因而文化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而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指出,文化是一张需要“深描”(thick description),需要研究者自身观念世界、研究对象观念世界以及读者观念世界三者间沟通的意义之网,因此文化研究的方法体系也有多个向度。文化话语包含的矛盾性以及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化作为话语语境的复杂性,通过话语语境化问题进行语言和社会研究也具有多种维度和切入途径,文化研究必然会突破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边界,构建独特的研究体系。

2 文化研究

1964年,在左翼出版商 Allen Lane 等人的资助下,伯明翰大学英语系现代英国文学教授 Richard Hoggart 以题为 *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的就职演说宣告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在这里起源的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该学派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对文化加以考察,分析社会和文化霸权的控制形式以及反霸权的途径,先后经历了 Hoggart 时代(1964—1968)、Stuart Hall 时代(1969—1979)、后 Hall 时代(1979—)的发展,从范式上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新葛兰西主义,从关注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到关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民族主义进而开展了青少年亚文化、种族亚文化、异常行为与犯罪亚文化、妇女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仅工人阶级、教育、青年亚文化、女性、少数族群、第三世界主题出现了新发展,“新时代”文化研究、修正主义文化研究、身份研究、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等新领域也随之出现,文化研究将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学科的成果纳入自身的知识谱系,逐步形成了具有反理论倾向的研究体系。由于社会环境的变更及英国其他大学文化研究的后来居上,1987年由 CCCS 与社会学系合并而成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CCS)在伯明翰校方末位淘汰体制下于2002年被关闭。Stuart Hall 等近50名学者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刊登公开信对伯明翰关闭事件表示抗议,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大学的相关院系与学者也以机构和个人身份向校方建言但仍无法改变 CCS(1987年由 CCCS 与社会学系合并而成)被关闭的事实。尽管如此,CCCS 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影响不会被抹去。今天,英国 Sage Publication Ltd, Routledge, Edingbrough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等出版机构大力出版文化研究专著和期刊,各大学也活跃着各种文化研究学术活动,这都表明奠基于伯明翰学派的英国仍然是全球文化研究的重镇。而从 Hoggart 因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而离开 CCCS 开始,伯明翰学派乃至英国文化研究已经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文化研究将影响延伸到加拿大、澳大

利亚、美国等地，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登陆中国。它在半个世纪里的发展不仅将自己推到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且在全球知识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化研究已经集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于一身，形成了鲜明的反理论倾向以及自己相对固定的主题和特征，具有独特的学术魅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书在对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学术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于文化研究的概念、研究方法以及主要议题进行了介绍。作者主要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建新教授学术团队组成。其中，第一章、第五章由谭晖撰写（第五章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 年第 2 期），第二章由林燕撰写，第三章由朱海玉撰写，第四章由沈文静撰写（部分内容即将发表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科学基金、新学科扶持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号：5100 - k15049），第六章由王晶撰写，第七章由丁建新、刘向东撰写（发表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八章及附录一由易莲媛撰写，附录二由全体作者共同整理。本书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研究”思潮的一种回应。由于文化研究系统庞杂，其谱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变化，加上著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疏漏、谬误，恳请专家、学者以及使用本书的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作 者

2016 年 4 月 20 日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二章 文化研究的概念.....	9
第三章 文化研究方法论	28
第四章 文化、权力与亚文化	37
第五章 后现代文化分析：以建筑话语为例	46
第六章 视觉文化	59
第七章 身体的文化研究	78
第八章 大众文化研究：电影的视角	90
参考文献.....	109
附录一：2014 年香港区域文化动态.....	122
附录二：文化研究关键词.....	136

第一章 概 论

一、引 言

滥觞于 20 世纪中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创立作为机构化的标志，由此起源的“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对文化加以考察，分析社会和文化霸权的控制形式以及反霸权的途径，因而它特指一种文化理论思潮和文化批评运动，同时也是研究文化的一种方法和视角。文化研究 20 世纪中期从英国起步进而于 70 年代进一步扩展，80 年代将影响延伸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地，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登陆中国，它在对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边界的突破中，集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于一身，形成了鲜明的反理论倾向以及自己相对固定的主题和特征，具有独特的学术魅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文化研究的兴起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是在英国社会文化危机中孕育的。“二战”以后，英国国内“福利国家”建设引发了社会 and 道德秩序的混乱，

2 文化研究

同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运动的消退,使激进的革命意识变得不合时宜,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生政治问题;而国际上苏联出兵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危机等变革也相继发生。国内外社会形势使英国知识分子陷入危机感与迷茫之中,他们在寻找对策和不断的自我修正中逐步形成了“新左派”(New Left)。“新左派”反对政治集权、经济统制和制度化的等级制,主张批判斯大林集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将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全面反思英国社会。他们活跃于不断发展的成人教育中,得以掌握了大量的下层人民生活状况资源,积累了介入文化事务的经验。这些都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加上美国“大众文化”进入英国所产生的刺激和影响,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作为社会思潮的出现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1.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与伯明翰学派

1964年,在左翼出版商 Allen Lane 等的资助下,伯明翰大学英语系现代英国文学教授 Richard Hoggart 以题为 *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的就职演说宣告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在这里起源的“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该学派一开始就注重文化的政治学,将时代和环境中的政治性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使文化研究的焦点都与政治事态紧密相关: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源于反不平等斗争,亚文化研究对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探寻对应着当时工人阶级和保守意识形态及政党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研究与女权主义运动紧密相关,种族问题研究也由种族主义斗争引发,研究转向中对英国教育和教育学的关注也源自于政治担忧,20世纪70年代研究对于 authoritarian populism 的理解也源自政治的右倾转变,等等。

2. 英国文化研究的 Richard Hoggart 时代(1964—1968)

Hoggart 时代(1964—1968)前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在范式上已经摆脱了文化精英主义,在这一时期 R. Hoggart 用 *The Uses of Literacy*

(1958) 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语境, 竖起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第一根标杆; Raymond Williams 贡献了作为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以及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958), *The Long Revolution* (1962);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还有 Thompson 的 *The Making of English Class* (1963), Stuart Hall 的 *Popular Arts* (1964) 等。关于这一时期文化研究的特点, 正如 Frank Webster 在 *Sociology, Culture Studie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2001) 一文中所言, 在社会科学突破结构主义和量化分析方法的统治而转向马克思和韦伯的背景下, 受社会学研究将“阶级”作为核心概念的影响, “阶级”成为分析和解释教育、休闲、审美等方面现象的尺度和标准。这是以“阶级”概念为基准的研究范式时代, 作为学术或知识的文化研究也因此打上了文化政治或符号政治的烙印。

三、文化研究的发展

1. 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

1.1 Stuart Hall 时代 (1969—1979)

1968 年, Hoggart 因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而离开 CCCS, 随后英国文化研究也从婴幼儿时代进入黄金时期: Stuart Hall 时代 (1969—1979)。这一时期的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及伴随而起的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种族歧视使边缘身份和弱势群体取代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反抗的主体, 因而文化研究重心也从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转移到了青年亚文化、媒介文化等领域。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 Antonio Gramsci 的 Hegemony Theory 的引入使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范式出现了新葛兰西主义转向。除进行阶级史、大众文化史及大众文化等传统性的研究工作之外, 文化研究逐步从抽象群体研究转向分化性事实研究。这一时期的 CCCS 开展了日常生活史的人种志研究, 关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民族主义进而开展了青少年亚文化、种族亚文化、异常行为与犯

4 文化研究

罪亚文化以及妇女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也成为该时期的研究重心之一,因而亚文化、媒介文化等是 Hall 时代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

文化研究通过亚文化系列研究、以亚群体形式进行的女性主义研究、媒体研究等改变了英国历史书写与现状分析对冲突的遮蔽,使反抗性和斗争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研究鲜明的主题特色。CCCS 在 70 年代(尤其是 1972 年)开展了意识形态系列讨论等活动之后,1978 年出版了至今仍被视为探寻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状况窗口的文化研究经典读本 *On Ideology*, 尽管它没有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进行探讨,也并未涉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民族主义,但它宣告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

1.2 后 Hall 时代(1979—)

1979 年至今,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后 Hall 时代。80 年代中期开始,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CCCS 的文化研究比此前两个阶段呈现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不仅工人阶级、教育、青年亚文化、女性、少数族群、第三世界主题出现了新发展,“新时代”文化研究、修正主义文化研究、身份研究、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等新领域也随之出现,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新语境下总结性反思与开拓性重构并重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和学理资源,同时将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学科的成果纳入自身的知识谱系,逐步形成了具有反理论倾向的研究体系。在后 Hall 时代 CCCS 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1972—1979* (1980) 中,文化研究被定位成“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领域,不同学科于其间交织在对社会的文化面向的研究之中”(1980: 7),文化研究必须保持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样性。这一时期随着 Michel Foucault 知识/权力理论、Derrida 解构主义、Edward W. Said 东方学、Jacques Lacan 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Jean Francois Lyotard 后现代理论、Jean Baudrillard 消费社会理论、Fredric Jameson 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ierre Bourdieu 的资本学说、Michel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美学的影响, 不仅包括 Williams、Hall 在内的伯明翰学者纷纷对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修正, 比如 Williams 强调意义的变异、Hall 对“表征”建构性的突显等, 文化研究里还出现了“快感政治学”等新领域, 产生诸如 Dick Hebdige 的 *Mistakes Identities: Why John Paul Didn't Do It His Way* (1981), *Framing the Youth Problem* (1983), *One Rout into Material Culture* (1984), *Even unto Death: Improvisation, Edging, and Enframement* (2001) 等代表作品。当代的英国文化研究也已将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思诉诸社会语境中的差异问题, 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具有了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文化研究的民族志等方法的研究也不断拓展, *The Topological Quality of Infrastructural Realation: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2012) 等研究成为文化研究通过 Topologies of Culture 等探索在积极应对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形式连续体的新秩序的信号与表征。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更及英国其他大学文化研究的后来居上, 1987 年由 CCCS 与社会学系合并而成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 (CCS) 在伯明翰校方末位淘汰体制下于 2002 年被关闭。Stuart Hall 等近 50 名学者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刊登公开信对伯明翰关闭事件表示抗议,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大学的相关院系与学者也以机构和个人身份向校方建言仍无法改变 CCS 被关闭的事实。尽管如此, CCCS 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影响不会被抹去。今天英国 Sage Publication Ltd, Routledge, Edingbrough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等文化研究专著、期刊出版的繁荣, 各大学活跃的文化研究学术活动都表明奠基于伯明翰学派的英国仍然是全球文化研究的重镇。

2. 英国之外: 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如果把 Hoggart 因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而离开 CCCS 视为伯明翰学派乃至英国文化研究国际化的标志, 那么英国之外各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以及知识分子理论构建与文化研究体系的互动, 使英国文化研究在不同领域、不同语境、不同地域实现了新的发展。

反抗性和斗争性是文化研究鲜明的主题特色。这一特色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文化研究中体现更为明显。他们的文化研究与自身民族解放、帝国主义霸权之下的斗争紧密关联,安哥拉 Frantz Fanon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后殖民时代民族身份研究、几内亚 Amilcar Carbral 对民族解放作为“文化行动”的认识、肯尼亚 Ngugi wa Thiongo 等人将文化研究与非洲革命经验结合都是文化研究在斗争背景下的产物。

美国文化在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兴起之前就有相对独立的生长点,其后也有自身过程逻辑,但它仍然遵从了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所构建的通约型学术规范。以大众文化研究为例,提出“文化消费主义”主张的 John Fiske 毕业于剑桥大学,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工作。他继 1978 年与 John Hartley 完成 *Reading Television*, 1989 年写成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Reading the Popular Culture* 等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后,在大众文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先后出版了近 10 部著作以及数百篇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和影视文化的研究论文,其“popular culture is everyday life”的论述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论断。此外,美国文化研究在各种运动和抵制中不断发展,逐步在欧美学术界取得了重要地位。成立于 2003 年的美国 Culture Studies Association (CSA) 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美国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举行第九届年会,云集了 30 多个国家约 400 所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的 540 名学者出席,其分 13 个议题进行的 600 多场会议和报告涵盖了国际上文化、艺术、经济等领域的视觉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城市文化等领域,作为闯入文化研究领域的时代新元素科技观念和实践也成为引人关注的议题。除了 CSA 的研究话题之外,中国文化、教育、危机话语成为文化研究近年来的热点,跨学科研究在美国文化研究中不仅得到坚持,而且将更加深入。

在欧洲,法国和意大利作为先锋艺术促生的文化研究代表,不仅有自身的特色体系,而且也影响了英国的文化研究。1957 年,法国学者 Roland Barthes 出版 *Mythologies*, 其细致的文本分析,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用结构语言学与符号学术语对“作